

权力腐败及其行政监察的博弈分析

傅菊辉, 彭中文, 唐觅飞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 使资源的配置失去效率, 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信息不完全和预期价值居高是导致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混合策略的最优行为选择分析, 认为作为理性人的权力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腐败行为与正常行为的比较效用大小。因此要搞好行政监察, 政府要把公职人员掌握的稀有资源压缩到最低限度; 同时要提高其正常的监管效用; 要鼓励公民和各类机构反腐防腐, 降低其腐败博弈时的预期价值等。

关键词: 权力腐败; 行政监察; 博弈论; 纳什均衡

中图分类号: D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1-0032-04

一、权力腐败原因的博弈分析

权力作为人类的伴生物是人类社会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社会现象, 可以这样说, 没有权力就没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 可能就是无论怎样掩饰, 影响统治、权力和权威都无处不在。”^[1]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在给腐败下定义时, 都是指政府官员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不正当地利用公共权力, 特别是将它与公共职位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定义腐败的:“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交换。”^[2]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对权力腐败的关注集中在行政权力上, 行政权力的腐败成了一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行政权力腐败的实质是一种交易, 其主要表现为“钱—权”交易、“权—权”交易和“情—权”交易等。

权利人在面对腐败与否而进行行为选择时, 和其他理性人一样有着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政府权力参与资源的配置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 为掌权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提供了制度基础。

(一) 信息不完全导致权力腐败

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完全信息并不是指某个人获得信息量的多少, 而是指这种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 所以信息不完全通常也称为信息不对称。

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是因为获取信息需要成本。要发现和查处腐败案件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个代价就是信息的成本。然而权力腐败者的行为一般都比较隐秘, 要察觉它们很不容易, 这就产生了信息的不对称。腐败者清楚自己的腐败行为, 而监管者掌握腐败者的信息极为有限, 且腐败者绝大多数会装出一副廉洁奉公的模样, 给监管者获取正确的信息增加了难度。因此, 要从腐败者的信息集里获取其败德信息, 不但需要监管者有足够的理性和韧性, 而且需要各方面提供相应的帮助, 否则监管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腐败者知道监管者精力有限、人手不够、财力拮据等信息, 要获得其腐败信息的概率很小, 将其抓捕归案的概率则更小, 那么他就会积极从事败德行为, 肆无忌惮的进行贪污受贿。

(二) 预期价值居高导致权力腐败

从权力人自身角度来说, 权力人在腐败与不腐败二者之间进行行为决策的时候, 正如他面临其它决策一样, 首先要进行成本预算。根据博弈论的预期价值理论进行分析, 由于腐败的预期价值远远大于不腐败的正常收入, 而惩罚的效用较低, 查处率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确定的系数, 故权力人往往会选择腐败的行为。权力人一旦有了第一次腐败行为, 他以后就很难收手。第一是由于他本身欲望的不断膨胀; 第二是腐败者的同仁不会轻易让其有偏离轨道的行为。初涉腐败的权利人面临一种不言而喻的威胁: 你继续合作, 双方盈利, 双方愉快, 只冒个人被查

处的风险; 你如果罢手不干, 那么这个圈子里的任何腐败者一旦被查处, 都可能对你进行举报, 因为你根本不享受这一网络的安全保护。显而易见, 个人被查处的几率要小得多, 更何况继续合作的腐败者即使面临个人被查处的风险, 他还有其网络提供的安全来进行弥补。因此, 每个人的最优选择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继续腐败行为, 这就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纳什均衡局面。

腐败者之间形成这样一种均衡, 结成一张相对严密的腐败网络。而这种网络要想被打破, 寄希望于网络中的成员是不现实的。因此, 这种均衡的打破只有借助于完善的制度安排与强有力的执法介入。不过必须特别说明的是, 博弈论中的效用函数总是与个人信念相关的。正因为个人信念的差异, 所以在权力人中间, 尽管有人腐败, 同样有人能够洁身自好。

二、权力腐败与行政监察的博弈分析

行政监察是在行政机关系统内专门设立的行政监督机关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的一种法律制度。国家设立行政监察制度的目的, 在于确保国家政令畅通, 维护行政纪律, 促进廉政建设, 改善行政管理, 提高行政效能, 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

腐败不但有收益, 而且也要付出成本。作为理性人的权力人是否进行腐败取决于对其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政府或监察部门在进行监察投入的决策中, 由于客观上存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 从而也面临一种与腐败者之间的博弈。

(一) 权力腐败与行政监察博弈的标准模型分析

反腐行为的监管其实就是一种博弈。博弈的双方就是监管者和腐败者。

(1) 监管者的策略空间。监管者的策略空间就是(查处, 不查处), 但实际上是查处比率和处罚程度的一种协调。假设权力人进行腐败行为时被监管者查处的概率为 P , 就定义 P 的查处比率 $P \in [0, 1]$ 。处罚程度 $N \in [0, +\infty]$, 于是监管者的策略空间就是 $P \times N = [0, 1] \times [0, +\infty]$ 。

(2) 权力人的策略空间。对权力人而言, 其策略空间就是(腐败, 不腐败)。是否腐败取决于两个

方面: 一是腐败行为的收益; 二是被监管者查处的概率和处罚程度。这构成了决定腐败行为预期效用大小的信息集。

(3) 腐败行为监管博弈模型的建立。模型的前提假设: 参与双方为监管者和权力人, 两者的收益函数为各自行为的效用函数, 行为准则为效用最大化。先对参与者双方的具体效用函数做出如下假定:

1) 监管者的效用函数。假定监管者尽职尽责, 做好本职工作所得到的正效用为 V ; 而当监管部门做出不查处的行为选择时, 其负效用就为 $-V$ 。假定监管者查处腐败行为时负效用为 $-X_1$, 查处合法行为时的负效用为 $-X_2$, 则查出腐败行为时的总效用为 $V - X_1$, 查出合法行为时的总效用为 $V - X_2$, X_1 与 X_2 之比为 N_1 , 即 $X_1/X_2 = N_1$, 且 $N_1 > 1$, 即 $X_1 > X_2$, 毕竟腐败行为较为隐秘而难于查处。

2) 权力人的效用函数。权力人进行腐败行为为选择时, 假定被查出受到处分、名誉损失等所得负效用为 $-Y_1$, 选择不腐败的行为得到的正常收入为 Y_2 , 选择腐败行为而没有被查处时所得非法收入为 Y_3 。

3) 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仍然为 P ; 处罚程度可定义为 N_2 , 是被查处的负效用 Y_1 与没被查处的正效用 Y_3 之比, 即 $N_2 = Y_1/Y_3$, N_2 越大, 说明处罚越严厉, 效用越低; 按照理性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准则, 腐败行为的效用 Y_3 应大于不腐败的效用 Y_2 , 两者之比用 $N_3 = Y_3/Y_2$ 表示, 以说明腐败行为的获利程度和腐败行为对权力人的诱惑力的大小。

图 1 是一个关于腐败行为监管博弈分析的标准模型。

权力人 (理性人)		
监 管 者	腐败行为	正常行为
	查处	不查处
	$V - X_1, -Y_1$	$V - X_2, Y_2$
	$-V, Y_3$	$-V, Y_2$

图 1 腐败行为监管博弈模型

(二) 权力腐败与监察博弈的混合策略选择分析

以下分别通过判断使权力人以“腐败行为”选择和监管者以“查处”为自己行为选择的充要条件, 来分析监察部门如何在查处概率 P 的约束条件下做出各自混合策略的最优行为选择, 从而制定有效监管权力人的一系列规则和法律规范。

(1) 权力人的最优行为选择。在查处概率为 P 时的权力人腐败行为的预期价值为:

$$U_1 = -Y_1 \times P + (1-P) \times Y_3 = N_3 \times Y_2 - (N_2 + 1) \times N_3 \times Y_2 \times P$$

权力人选择正常行为时的预期价值为:

$$U_2 = Y_2 \times P + (1-P) \times Y_2 = Y_2$$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权力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 $U_1 > U_2$ 是否成立。由于

$$U_1 > U_2 \Leftrightarrow P < (N_3 - 1) / [(N_2 + 1) \times N_3] \equiv P_1$$

因此,曲线 $P_1 = f(N_2, N_3)$ 就是权力人的选择依据,也就是权力人选择腐败行为的充要条件。据此,我们可推断:①如果 N_3 非常大而 N_2 比较小,则 $P_1 \rightarrow 1$,故 $U_1 > U_2$ 几乎完全成立。即如果腐败的预期价值远远大于正常行为的效用,而查处后的处罚比较轻时,腐败行为几乎处处发生。②如果 N_3 很大,而 N_2 也非常大,则 $P_1 \rightarrow 0$, $U_1 > U_2$ 几乎完全不成立。其意义是,如果腐败行为的预期效用远大于正常行为的效用,但查处后的处罚非常之重时,腐败几乎不可能发生。③如果 N_3 非常小,即 $N_3 \rightarrow 1$ 时,则 $P_1 \rightarrow 0$,即 $U_1 > U_2$ 几乎不成立。即如果腐败收入并不比正常收入大多少,就不可能有腐败行为发生。因此,腐败行为最可能发生在能够牟取暴利的地方,如果腐败行为的不被查处或查处后的处罚太轻,则腐败行为就会在很多领域频繁发生。

(2) 监管者的最优行为选择。比较监管者查处的期望效用为: $U_1 = V - X_1 \times P - (1-P)X_2$, 不查处的期望效用为: $U_2 = -V$, 要使得监管者查处,必需是 $U_1 > U_2$, 由此得到: $P < (2V - X_2) / (X_1 - X_2) \equiv P_2$, 把它的约束曲线记为: $P_2 = h(V, X_1, X_2)$, 既定的情况下监管者的行为选择区域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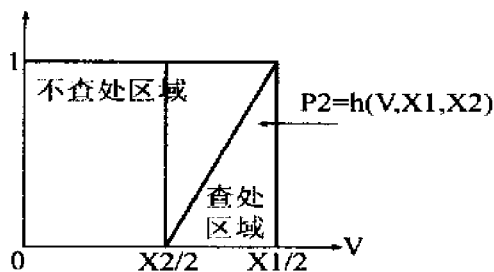


图2 监管者的行为选择区域图

根据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准则,监管者的行为选择取决于正常监管效用的大小:当 $0 \leq V < X_1/2$ 时,监管者选择不查处;当 $V > X_1/2$ 时,监管者选择查处(包括正常行为和腐败行为两方面);当 $X_2/2 < V \leq X_1/2$ 时,两种监管行为都可能发生。结合均衡所得具体结论,要避免监管者不查处腐败行为,就必须提高正常监管效用 V 达到临界值 $X_1/2$ 以上,必须

从外部制度安排提高监管者查处工作的积极性。

三、权力腐败监管制度安排的有效选择

综合以上分析,腐败行为监管制度安排的有效选择基于3个因素: P , N_2 和 V 。具体表示为约束曲线 $P_1 = f(N_2, N_3)$ 和 $P_2 = h(V, X_1, X_2)$, 故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权力者和监管者行为选择的一些结论。

首先,从权力人的行为选择方面分析。腐败行为为监管制度安排的两种有效选择:①当处罚 N_2 比较轻时,必须提高查处的概率 P , 才能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②在查处概率较低时,必须通过重罚来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有效的腐败行为的监管制度安排实际上是查处概率和处罚程度的一种协调。其次,从监管者的行为选择方面分析。监管者的最优行为选择有赖于从外部制度安排来提高其正常的监管效用 V , 在有效监管制度的安排下,权力人的最优选择(或理想选择)只能是正常行为。

另外,我国的监察制度和监察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弱效性。因此,要提高权力腐败的行政监察效用,其监管制度安排须从以下方面入手。

1) 政府应积极构筑权利腐败的防线,把公职人员掌握的稀缺资源压缩到最低限度,从根本上消除各类腐败机会。政府的行为应尽量控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之内,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2) 监管制度的有效安排在于提高监督部门的正常监察效用 V , 并提高查处率 P 和处罚力度 N_2 , 降低权力人的腐败预期效用以约束权力人的腐败行为。

3) 监管者的最优行为选择有赖于外部制度的安排,应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来提高其正常的监管效用 V , 避免不查处腐败行为的情形出现,在有效的监管制度的安排下,权力人的最优选择只能是正常行为。

4) 公务员的薪金应该能够达到合理且期望的水平,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政府机关。政府应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优秀业绩应得到认可。

5) 发挥集体力量,鼓励公民和各类机构广泛参与反腐败、防腐败。对权力人进行间接教育,降低其

进行腐败博弈时的预期价值; 改变公众对腐败现象的心理认同值, 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和进行举报。

参考文献:

[1] 迪韦尔热. 政治社会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2] 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3]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4] 施锡全. 博弈论[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 [5] 章剑生. 行政监督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6] 胡鞍钢. 中国: 挑战腐败[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7] 贺卫. 寻租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On power corruption and its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FU Ju-hui, PENG Zhong-wen, TANG Mi-fei

(Marxism Colleg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power corruption is a social cancer, which makes the allotment of social resources inefficient and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seriously.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high expecting-value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corruption. The authors give an analysis of the mixed strategy and hold that whether the reasonable power decides on corruption depends on the comparative utility of the corruption behavior and normal behavior. Some administrative suggestions are brought up here.

Key words: power corruptio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game-theory; Nash-equilibrium